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

主编／谢冕 副主编／李杨

# 都市的迁徙

●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  
李书磊／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

主编 谢冕 副主编 李杨

# 都市的迁徙

● 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

李书磊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

DUSHIDEQIANXI

李书磊 著

责任编辑:胡卓识

封面设计:章桂征

---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12000 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  
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印数:6 000 册 定价:4.30 元

---

# 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总序

谢冕

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已把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抛在了身后。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百年的长途之上，洒满的是汗水、泪水和血水。那是一条为苦痛和灾难所滋润的道路，那又是一条屈辱和创伤铺成的记忆之路。近百年我们中国人希望过、抗争过，也部分地到达过，但依然作为世纪的落伍者而存在。落伍的感觉残忍地抽打着中国，使我们站立在世纪末的风声中难以摆脱那份悲凉。

中国知识分子未曾辜负这一百年，他们和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共命运。自从上一个世纪中叶中国海附近出现了在当日的中国人看来是怪物的西洋舰队，那隆隆炮声中腾起的硝烟惊破了强盛的帝国梦想。随后开始的是列强为所欲为的践踏。中国从自认为天下第一的王国尊严下跌到负数。这造成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重压。

这一百年有过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牺牲，知识分子没有回避他们承担的那份感世忧时的沉重。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般的保守麻木，使中国知识分子自然生发出文化精英意识。这使他们自觉地对时代和社会作出承诺。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激情与作为精

英的使命感相结合，造出了极为动人的精神景观。近百年的社会激荡之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与智慧的投入。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本世纪下半叶为结束中世纪式的文化暴虐而进行的抗争，中国知识分子都付出了积极的劳绩。

艰难的时势加上历史的积重，特别是与外界接触之后反观自身，一些新鲜的先锋的思考遭受封建积习的禁锢，促使知识界的先进人士对传统文化秩序持警惕的和怀疑的态度。当挽救危亡和变革现实的奔走呼号受到传统势力的扼杀和阻挠，这种激进的立场便获得了社会广泛的同情与理解。由此派生出来的革命性即寓于对传统的否定之中的价值判断，也就成为当日普遍的思维倾向。

这当然是一种偏颇。中国悠长的文化传统是历代中国人创造实践的综合，它拥有的智慧性和沉雄博大都曾使世人为之倾心。在古代和今日，中国文化为丰富和促进世界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无可置疑。中国人理应为自己先人的建树自豪。但中国文化在它发展历程之中形成的封建性体系和价值观，作为维护过去社会形态的原则体现，已成为现代社会前进的羁绊，这当然具有消极的品质。基于这样的前提，对传统文化加以质疑而有所扬弃有它的合理性。

我们希望站在分析的立场上，我们愿认同于近代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呐喊、抗争以及积极的文化批判。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往这一目标的障碍。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保存和发扬那些优良传统的必要，而避免采取无分析的一概踩倒的激烈。

不偏不倚是庸俗的。因为这种想法迎合了所有人而可能掩饰和冲淡原本的积极动机。本世纪才智之士的文化批判是前驱的抉择，觉醒的知识者心仪于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决绝于陈旧

的历史重荷。为图新而弃旧，因前进而义无反顾。他们把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一律视为压迫而指归于反抗。要是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对自由人性和民主体制的戕害，我们当然不会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言行感到意外。当然，我们希望当我们面对现代的诱惑时不至于忘却先世的辉煌——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膜拜。

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危亡时世太重也太深，为此文学曾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象；人们发现教育、实业或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够救民于水火。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个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

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的情景极为动人。即使是在文学的废墟之上我们依然能够辨认出那丰盈的激情。我们希望通过冷静的反思去掉那种即食即瘼的肤浅而保留那份世纪的忧患和欢愉。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导引，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文学救亡的幻梦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正是因此，我们方在这世纪黄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种和耕耘。

文学回到家园的醒悟仅仅是最近十年发生的事实。在以往我们花费在非文学上面的精力的时间太多了。在文学研究领域，这种花费表现在文学被指令无休止地为其它意识形态注释。他们借文学说他们的故事，文学真的变成了叫做传声筒的东西。现在我们终于有权力发问：文学难道不应关心自身？当然文学应该

也可能关心文学以外的世界。但不论是权威还是神圣，他们要文学做的，必须通过文学的方式和可能，这包括文学的旨趣。

文学必须建设和完善自身而后才能建设和完善社会，文学也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径关注社会。这一百年的文学发展迅猛但并不健全，在某一个或几个时期（如六十年代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学甚至成为社会的破坏因素，而这一切恶行却是以庄严和神圣的名义进行的。

作为二十世纪的送行人，我们感到有必要把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达。这种表达当然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我们期待着放置于百年忧患背景之上而又将文学剥离其它羁绊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意味着绝对的纯粹性，它期待着文学与它生发和发展的背景材料的紧密联系。我们希望这种思考是全景式的，通过对于文学追求的描写折射出这个世纪的全部丰富性。

以往对于文学的描写大体总是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笼罩之下进行。文学在批评和历史研究方面的独立的合法性并未得以确认，文学没有进入自由状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畴的提出为健全文学研究提供了契机。以一百年的文学为单位对文学的总体观照的方式自然地扬弃了非文学的干扰，从而有可能对文学进行独立的和自由的考察。我们希望这种文学研究不仅为纯粹学术品质的倡导提供可能性，还希望为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对我们所传达的世纪之交的情怀保留下一些特殊的记忆。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于厦门美仁新村

##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小说的城市血缘 .....	( 1 )
第二章	小说家的身份革命 .....	( 31 )
第三章	郁达夫：城市感伤 .....	( 65 )
第四章	沈从文：城市幻觉 .....	( 98 )
第五章	茅盾：城市研究 .....	(132)
后 记	.....	(155)



# 第一章 现代小说的城市血缘

## 1. 1. 小说观察的城市角度

(小说研究的困难——“生活方式”的观点——现代城市的兴起——现代文坛作为城市现象——中国小说的城市血缘——小说业的市场化——小说的地位与城市的发展——从城市角度观察小说的必要与可能)

在本世纪初中国小说大规模繁荣之后，中国学者才开始了对小说的自觉研究，小说研究才开始被中国学术界所接纳。从难度上讲，小说研究是一种微妙而危险的工作，一方面它是“研究”，“研究”是一种科学行为，需要诉诸理性分析；另一方面它的对象是“小说”，“小说”是一种情感形式，需要依靠感性体验。而这两者常常是顾此失彼的。当然这种走钢丝般的尴尬局面是所有文学研究都难以摆脱的，但小说研究较其他而言则更容易走上歧途。一方面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性使研究者必须借助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等科学理论才能充分把握，小说作为篇幅巨大、背景复杂的庞大现象同时还要求研究者进行历史与传记材料的收集、考据与辨析，这本来就容易使研究脱离审美过程；再加上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与单一性带

来了人们社会科学思维的贫乏与机械，由于中国“小学”传统带来了盲目考据的不良习惯，中国的小说研究往往出现“僵死的理性化”倾向，在小说研究中排除了小说的感觉本性。另一方面，小说情节尤其是细节和语言的丰富性易于使人们停留在“赏析小说”的表面层次，事实也确实有大量的“小说研究”象古代的小说评点那样浮光掠影，夸奖几句，赞叹一番，甚至仅仅象一个留声机那样把小说的情节复述一番了事，这可以称之为“恶劣的感性化”。更可怕的是这两种相反的偏向还往往会不可思议地结合起来——不少人把赏析文章也写成了一个僵死的模式。这样就把小说研究这样一种智慧方式推向了绝路。当然中国小说研究界的优秀者们在不断地对这种研究疾病进行抗争，而且近十年来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小说研究并没有走出这种两难的境地而达到一种两全的状态，并没有出现整体的学科成熟。这可能也同中国小说研究的历史较短有关，历史短就缺乏积累与成熟的充分时间，在年龄上会自然地处于粗陋的幼稚期。从纯粹学科设计的角度看，小说研究的理想状态也许应该是理论分析与审美感知不露痕迹的和谐，达到对于小说同情而真切的理解和认识。

然而，我们知道，任何理想状态都是研究者的一种自我期许，都象地平线一样不可企及，它只是一种评价标准，它的真正意义是成为不断摆脱现实缺陷的修正力量。面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课题我在考虑自己的研究角度时，就把自己的各种选择置于这种理想标准的评价之下，从而在力量可及的范围内作出最佳的选定。我发现必须找到一个可以调和理性与感性、思想与情感的有利角度作为小说研究的切入口，在方法和出发点上占有一种天然的优势。我最后决定从“生活方式”的观点来观察现代小说。“生活方式”也即人生存的基本形式，而作为

人们感情形式和思想形式的小说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折射同时也是生活方式的一种构成。一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那个时期人们的小说创作具有双重的因果关系：它既成为小说创作的对象，又影响小说创作的主体；从而既为小说提供材料，又为小说提供形式，既决定小说的思想状态，又决定小说的情感状态。从这个角度入手，可以较为有效地避开以往小说研究的偏差，用尽量接近小说本性的办法来研究小说，达到对于小说的活的把握，获得一种文学研究的整合性与全面性，在不牺牲小说的情感特质和艺术特质的前提之下实现对小说的社会性认识。同时，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文学，也可以使人文研究和形式研究的矛盾得到统一：即使人文研究立足于艺术形式，又能发见艺术形式的人文积淀。而且，具体到现代中国，人们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处于一种转折性的变化之中，从生活方式的改变来理解现代小说变迁，就具有了一种宏观的、历史的概括意义。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二十世纪以来生活方式最明显也最深刻的变动就是现代城市的兴起。现代城市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组织方式，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分布结构，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现代城市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它还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概念——它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可以借用一句现成的用语：现代城市的出现实际上是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十九、二十世纪东西方之间不同民族的也是不同文明的战争中，中国原有的封闭的、自然状态的城市遭到破坏，西方世界对中国殖民化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使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接受了一种新的模式改造，并使少数的沿海城市出现了尽管是畸形的现代繁荣。中国的城市由原来单纯

的政治、文化中枢而兼任了工业和商业的中心，开始摆脱原来对于乡村的同构性而取得对于乡村的异质性和独立性，因而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现代性。尽管中国城市的这种现代化至今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进程，尽管中国城市中的传统因素至今仍然顽固地存在着，但二十世纪的中国毕竟出现了现代城市精神和传统城市精神的剧烈冲突，而这种冲突的过程也就是现代精神对传统精神不断征服并最终取胜的过程。从大处着眼，中国的二十世纪文学实际上是这种冲突、这个过程之中的一种社会存在。一个常被遗忘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现代文坛实际上是一种城市现象，中国现代文人是一个城市阶层，而现代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城市活动。事实上可以说现代文学就是现代城市中的一种“无烟工业”。中国现代文学就存在于中国二十世纪城市的环境、氛围乃至区域之中，它本身就是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文学的城市文化性质是一个常识，但它又是一个不被记起的“沉睡的常识”。唤醒这个常识就如同点亮了我们的一只眼睛，使我们马上获得新的发现和新的觉悟，对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有一种新的见解，并获得一系列新的语言。

如果说，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整个文学都有一种自然高度的话，那么，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小说尤其是研究小说史则更有一种特殊理由。简单地说，中国小说具有一种城市血缘。中国小说起源于城市，这已为历史家的充分考据所证明。作为小说雏形的说话，最早是一种宫廷艺术，后来又变成一种市井艺术，是城市中的上层与下层共同拥有的一种娱乐形式。说话的发达直接归因于城市的发展。两宋的都城开封和临安已具有了相当规模。开封户数多达二十六万<sup>①</sup>，临安也是“参差十万人家”<sup>②</sup>。开封“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sup>③</sup>，临安“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

家不买卖者”，“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sup>④</sup>这里描绘的其实是典型的古典城市景观：人群、市井、陌巷和坊肆。说话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一种相当规模的职业。古城居民的生活余暇和娱乐欲望对说话业产生了需求，而城市人口的集中、经济的富裕又使说话业的发达成为可能。城市中娱乐业对商业的加入使说话成为一种日常性的职业活动，城市中市场的繁荣对说话形成一种积极刺激，使说话业进入了整个城市市场体系的良性循环。城市中专门的营业性娱乐地点“瓦子勾栏”的出现，以及众多茶楼酒肆的存在，使说话业的繁盛获得了一种场所保障。这样说话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城市现象，打上了鲜明的城市文化烙印，它体现了城市居民的趣味和愿望。当然说话业对乡村有所波及，如陆游的诗所载“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但据胡士莹先生考证那多是“城市的讲史艺人下乡的”，称为“打野呵”，是说话业的一种不规则流动。<sup>⑤</sup>古典城市的兴盛终于使说话走出了宫廷和寺庙，成为一种独立于政治和宗教的文学艺术活动。中国小说的繁荣也正是这种古城说话业的结果。小说创作一方面成为说话的一种记录和整理，另一方面也是说话的一种准备和提示，前者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样在说话基础上长期演化而成的长篇小说，后者如后来明人拟话本这样纯文人创作的短篇小说。中国小说繁荣发达的这种特有原因使它变成了一个闯入文学世界的异己者，使中国文学出现了一种新质或者是异质。过去的文学主体诗歌创作主要是一种个人遣兴和抒情的雅事，其对社会的交换价值倒是次要的；而现在的小说创作则主要是有关生计的一种实业，它的寄情、教化作用则是次要的。伴随着城市繁荣的小说带上了市场的烙印，使创作由一种相对自足的个人性封闭行为变成了一种有赖于顾客取舍和市场行情的社会性外向行

为。当时印刷小说的书坊和讲说小说的艺人都是一种市场现象，这就决定了小说创作的商业性质。这种实业化、市场化的特征是中国小说城市血缘所包含的主要意义。后来小说的不断繁荣发展也是和城市的不断繁荣发展相联系的，而所谓城市的繁荣发展也就是市场的不断扩大、丰富、提高和成熟，小说的进步实际上是由城市市场格局的变迁而推动的。

由于这种原初的都市血缘和后来的都市血脉，千百年来的小说作家们其实是在一种矛盾的心理状况下从事创作活动的，或者说小说这种城市事业是在两个不同的衡量指标下徘徊的：一方面，小说是一种商品，它需要打开市场因而需要迎合读者；另一方面，小说又是一种精神产品，小说创作不同于机械的工艺制作，小说作者又需要通过小说来表达自己。迎合读者与表达自己的冲突构成了古今小说家共同的困境，今天“雅”文学与“俗”文学的竞争与碰撞就是这种困境的一种表现。当然有时候这种矛盾会得到某种统一，如二十世纪初茅盾办的《小说月报》，因老报要迎合一帮渴望新文化的城市青年，致使宣传新作家启蒙主张的《小说月报》广为流行；有时候这种矛盾会出现某种失衡，如本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小说被当成了一项党派宣传事业，自由的市场机制不复存在，也就难以作为常态分析了。从总体上看，中国小说的商品性质（源于读者迎合）似乎比它的艺术性质更突出，在很大程度上艺术性质（源于个人表达）是从属于商品性质的，在很多情况下所谓小说“艺术程度”是小说这一商品的质量指标，是商品的一种设计和装潢。这就使得小说直到今天也基本上保持着大众艺术的面貌，只是由于大众素质的不同而有些面貌变化而已。这就和诗歌散文的处境和面貌大异。在古代中国，刻印诗文往往是自己出资，以赠送亲友，传诸子孙；而刻印小说则是书坊的一种投资，用以广

为出售，牟取利益。文学界之中这种性质上的分裂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小说的城市文化性质。

小说的这种外部处境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内部状态。首先是它的语言，由过去文学样式的文言而转为白话。文言是一种非卖品，是商业城市之前政治都城中贵族社会和文人圈子中的一种侈奢。那些堆砌生僻词字、把诗文弄成天书的创作现象也正是文学在城市化之前的典型状况；而小说是文学城市化的代表，它出现在都城中市场成熟——也是真正的城市诞生——之后，它的市场制约和商品本质使它不能不最大限度地把语言通俗化以求得尽可能众多的顾客。这也许就是宋代以后小说白话出现的最令人信服的解释。还有中国小说的情节崇拜，也同它的城市性有极大的关联。古代小说作为一种市井听觉艺术，直接面对城市听众，小说效果要受到听众的现场检验，情节的曲折与否就成了判断小说价值乃至决定小说生存的最关键因素。这也就影响到中国小说叙述性多而描绘性少、重动态而轻静态、重故事而轻心理的基本传统。中国的小说是一种城市活动，它不得不受到活动性的制约。

小说商业性的判断在一个事实面前遇到了困难，那就是，中国古代许多小说含有许多道德劝戒的成份。这种道德劝戒似乎可以见出作者们的非娱乐、超商业的用心。当然我们不能把小说的商业性绝对化，把小说的这种基本性质看作它的全部性质；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道德劝戒至少在两方面同样带着商业化的色彩：它实际上也是对市民读者与听众的一种迎合，大众也是需要某种道德自慰的；再者它也是对当局的一种应付，以求得小说免于被禁、被焚的命运，是一种自我保护色。我们看《金瓶梅》后半部的道德劝戒就大致可以明白这种劝戒的真正意义了；如果作者真是想警劝后来者的话，他就不会在前半部对

性行为进行那样的渲染了。

两宋至明清，由于城市商业的出现——这是城市最初步的发达状态——而导致了小说作为一种崭新文学样式的崛起；但是，因为城市初步的发达而使小说崛起，也因为发达的初步而使小说不能堂而皇之地走上大雅之堂。直到清代，四部全书总目和由四部而衍生的图书分类法还不设小说类目，小说是被排斥在正统文献之外的。由于城市还没有充分发展，传统士大夫的趣味和眼光还在左右着文坛和文化，城市的真正代表者——市民的数量和力量还不够众多和强大，还不能对文学格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代表他们审美意识的小说仍然不被正式承认，也就仍然达不到高度的繁盛。如果说小说高度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土壤的话，那就是城市的高度繁荣。缺少了这种土壤就谈不上小说的兴旺，即使有些文人独具慧眼、大力鼓吹也无济于事。明代叶昼就高度评价过小说作品，说“可与天地相终始”；而金圣叹也极力地鼓吹过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但明代小说终于没有被作为正统文学接纳。只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西方的文明之风使中国城市一夜之间旺盛生长起来之后，梁启超再大声鼓吹小说就有了令人欣慰的回应，到了今天小说已成为文学的主要样式。这不仅意味着小说拥有最广大的阅读层并占据着最大量的文学出版篇幅，而且意味着小说在文学格局中据有了代表性和领导性的地位，“小说曾经被看作下流”的历史事实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显得遥远和难以置信。文学格局的这种改变、小说地位的提高对小说自身和内部的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极大地影响了小说界和小说家的自我期待和自我要求，减少了过去那种较多的消费性和娱乐性成份而更多地加进了严正性和神圣性，并且在与某一部分城市读者的联系中加强了进行艺术探索和形式追求的纯粹性和主动性。在很大程度



上，文学的正统地位是一种模式，一个角色；当过去诗歌据于正统地位时，它按照这种模式扮演这种角色，现在轮到小说来扮演了。小说成为正统以后，它的城市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而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这就象一次自然的选举：城市用它的力量把小说推上去了，但小说上去之后就不能仅仅代表城市了，它就得增强广泛性和全体性。小说社会性的这种加强主要表现在二十世纪以后中国小说政治色彩的浓厚和政治干预意识的加强。——当然，这已是后话。

城市对小说的影响还不仅仅表现在小说的城市文化性质上。城市作为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生活样式和生活形态成为小说这种文学方式最重要的表现对象，城市生活的多场景性、广泛联系性和充分的机遇性使它天然地具有小说的故事特征和情节特征，城市人复杂而细腻的内心活动也成为小说进行心理描绘的丰富资源。小说家作为城市人也受到了城居生活深刻而微妙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为评价生活的心态也体现为表现生活的形式。

毫无疑问，中国小说的城市血缘和城市血液使我们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成为必要。而现代文学报刊和现代新闻纸所记载的丰富的城市史料和文学史料，现代文化人类学城市研究所取得的理论高度，使我们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现代小说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不仅可以对已成为历史的小说和小说的历史有一种全新的发现，而且可以对过去现代小说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作出全新的理解。比如过去大家都纷纷讨论又讨论不清的“国民性改造”主题，那实际上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一种侵入和干预；再比如现代小说史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倾向的分野和冲突，那实际上是一些作家的城市心态与另一些作家的乡村心态的各自表现。